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民族史书写

——重读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

周竞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要]近代百年,民族史书写成为与现代中国建构密切相关的文化事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引入为人们全面辩证认识历史中国的“民族”状况提供了重要理论工具。吕振羽先生作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著就了他那个时代最具特色的《中国民族简史》,重读这一著作对于进一步理解中国历史转型中的民族关系及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确立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民族;简史;革命;民族史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02.017

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时代,个人的行为和思想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受时代局限,科学理性是思想超越时代局限的重要路径之一。新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吕振羽先生生活于中国国家、社会、观念等转型最为剧烈的时代,他从一个工科学子转而成为中国史学研究成就卓著者,成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语境中书写了第一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史著作——《中国民族简史》。生活于政治稳定、经济社会生活日益繁荣、各民族交往交流普遍化的当代中国,重读 70 年前的著作,虽然明显感知到作者时代的局限,仍可透过作者表达的革命激情看到国家和社会转型带来的思想和观念的转变以及作者明晰的科学理性。因此

说这是一部充满革命激情的著作,也是一部不缺乏科学理性的著作,其在国家转型关键期引领了民族史学研究的潮流,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传播的重要著作之一。

一、家国命运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人生道路的选择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家庭影响常常是最直接、最基本的影响,家庭常常成为一个人生命画布上最浓重的底色。吕振羽先生 20 世纪初出生于湖南省西南部的一个小村落——溪田村(今属邵阳县),他所出身的家庭为自耕农,其曾祖父曾参加过太平军,祖父因博闻强记和性格豪爽在乡间颇有声望,家有薄田几亩,其父早年在乡间就学,后在村中执教,过着半

耕半读的日子。在他童年成长中,父亲对他产生过巨大影响,“吾父个性尤类先祖,力疾豪强,同情愚弱,常为羽兄弟道农村黑暗,至明白而易晓。于羽兄弟之生活意识,殊有至大影响。此殆由其困厄生活中所得之体念欤!”^[1]尽管家境并不富裕,他仍然在父亲支持下有机会到田心村玉公山坊继续学习。^[2]1915年,15岁的他入学武东中学预科,这是一所新式学校,在此他获得一些新知识和新理念。一年后,他考入武冈县立中学,受到当地有名的国学家和维新派人士萧承舆的启迪,立“如国家民族危亡,当拜谢祖宗,舍身以赴”^[3]之志。在学期间,作为一个有报国之志的热血青年,他组织和参与响应“五四”运动和“反日货”等社会活动,并接受了工业救国的思想。这一思想促成其中学毕业后考入长沙湖南工业专科学校学习机电,期间还受到过无政府主义等思想的影响,组织和参与“东四区学会”等活动,试图建立一个没有统治者、没有剥削,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衣食饱暖的“极乐园”。^[4]失败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虽然并未使他看到理想实现的希望,却使他有机会结识了两位对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一位是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委员夏明翰,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湖南省学联负责人;一位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当时他正在湖南大学法科讲授“新社会学”。

1925年,吕振羽先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国民党,并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任新编一师政治部宣传科长,还曾代理师政治部主任。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他离开军队,到日本明治大学攻读经济,第二年回国。

在吕振羽先生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实践之时,中国国家政治转型加剧,社会政治形势复杂而多变,当政治混乱的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结束后,国民政府成立,国家政治结构发生重大转变,但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并未解除,社会发展方向仍然处在大选择之中,无数仁人志士此时进行着理论和实践的广泛探索,革命显然是这一复

杂探索的基本活动,经历过改造的国民党已走向独裁,共产党组织在几经破坏后艰难成长,并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间的联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日益传播,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成长出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吕振羽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经历过社会革命实践失败后,1929年吕振羽先生来到北京,初受湖南省地方自治筹备处处长曾继梧的委派,专赴河北与山西省考察地方自治的情况,后经人介绍与“村治派”主要人物相识,并在京编《村治月刊》,投身于村治研究,先后在《村治月刊》等刊物上发表《北方自治考察记》《农村社会之本质与前途》《由现代民主政治之一般的矛盾说到人民自治》《乡村自治问题》(上、下)、《农村自治问题论》等一系列专论文章,系统阐述关于中国乡村自治问题的理论见解。^[5]在“村治”实践的观察和研究中,与同时代的一般研究者不同,他的研究更倾向于实践性和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映,更具有革命性特征。1930年他参与创办《新东方》杂志,组织“东方问题研究会”,站到关注中国社会命运的研究前沿,其理论思想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转型。有研究认为1930年下半年至1932年,以一系列重要学术著作的发表为标志,吕振羽先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形成和确立,如《中国国民经济趋势之推测》(1932年11月)、《中日问题批判》(1932年2月)和《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上册,1932年5月)等论著。在《中国国民经济趋势之推测》一文运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方法提出和分析问题,研究中国社会性质及其发展趋势,成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和思考中国现实问题的标志。《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上册)则显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及其对理论体系把握的全面性和成熟程度。^[6]当然,他的脚步并未仅仅停留在编辑相关理论文章和理论思考之上,他还积极参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筹组热河抗日义勇军等革命实践活动。

二、革命语境中的中国民族简史书写^[7]

民族史的书写是近代以来,中国从王朝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中的一个重要社会历史现象,早在清末民初就受到社会精英和新知识分子的重视。辛亥革命前,“民族国家”理念成为影响中国王朝国家转型的基本理论之一,早期的革命组织和“反清排满”志士依据西方民族国家理论重新规划中国社会,革命成为“富国强民”的重要途径,在革命中“反清排满”的汉族学者开始撰写汉民族史,这一时期,汉民族史与中国民族史在革命排满的著作者那里具有同指性,在这一语境中,王朝历史上被称作戎、夷、蛮、狄之裔多以汉民族或中国民族侵入者的面貌被书写,在近代化了的“皇汉民族”视野中,“五胡乱华”的王朝历史被民族主义理论所改造。清王朝被推翻后,受到统一多民族封建王朝国家长期历史传统的影响,并未能建成真正的汉民族国家,国家政权迅速为军阀所把持,军阀政府继承王朝历史资源以“五族共和”相号召,政治方向上选择维系王朝国家结构中戎、夷、蛮、狄之裔与中央政权的隶属关系,因此,如何将王朝国家境内多元文化或文化差异较大的众多族体纳入转型国家体系之内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关系到国家转型的实践。用“民族”概念重新书写历史上文化差异性族体之间的历史联系成为史学研究的潮流,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中大汉族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的思想并存且相互激荡,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还发生着激烈的竞争。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民族”概念由特指汉族到指称王朝国家内各文化差异性群体,内涵几经变化。当民族、民主、科学等一系列与工业革命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相关的概念用于重新建构和审视中国社会生活之时,中国民族史的书写已突破传统“华夷”观的单一视角并不断接受着源自资本主义社会的理念影响。

当不同族类共同体的历史不再以王朝中国传统的“某某人”或华夷概念分析,而是以“民

族”概念分析和书写时,受到国家转型阶段性和社会政治状态的强烈影响,中国民族史书写则产生了不同类型或变体,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两个历史时期表现出更重要的差异性。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民族史书写将主要注意力置于“汉人”的民族化和“满人”或非汉人的民族化过程。民国初年,民族史的追溯已呈多元化态势,不仅汉人的历史书写已民族化,汉人周边族体的历史也开始逐步“民族化”,西方国家语境中的“民族”作为新理念或概念改头换面地应用于国家政治转型和社会剧变的中国,民族不仅在族类分型层面上被应用,也在国家领土这个层面上被应用,人们对“民族”在理论上虽然还有许许多多的不同认知,却成为封建王朝中国向主权现代国家转型进程中重要的思想概念之一,与新的国家、人民理念一道流布于新知识精英层,及至抗日战争,包含着各种被民族化或尚未被民族化差异性族体的国家民族概念——中华民族的建构获得重要条件,换言之,抗日战争成为催生包含各族体的中华民族概念为社会所认知或追求的重要外部力量。在此过程中,显然特定族体的中心化业已形成并影响到国家政治的转型,其中,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阻碍着执政的国民党在实践民族民主革命目标中适当处理各族间关系,从这一背景来说,《中国民族简史》也成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批判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檄文。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吕振羽先生就以革命者的身份活跃在斗争实践之中。1938年,受中共湖南省工委派遣,至邵阳筹办塘田战时讲学院,此前,他则实际负责“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及其外围组织的革命活动,通过出版进步刊物、举办时事座谈会、邀请名人讲演等多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湖南的抗日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自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在各类报刊上发表30余篇13万余字的政论、时评,揭露日寇侵华本质,严厉批判托派言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8]正是在革命实践中,他认识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在《中国民族简史》中直接提出:“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要解决的国内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土地问题,一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我们也有着正确的原则、方针,并早已正式提到行动日程上,不过在全国人民,以至最先进人士里面,大多还不如对于土地问题那样熟悉。现抗战胜利结束,进行到和平民主事业的斗争,国内民族问题立即就要全面地提到行动日程上,我们应同时展开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9]革命激情和敏锐性,促成了他在戎马倥偬生活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研究中国民族问题,以求中国社会在和平民主事业斗争中能正确处理国内民族问题。《中国民族简史》最早于1947年2月由大众印书馆印行,1948年9月由光华书店印行,^[10]1950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增订本,2009年人民出版社以1950年版为底本重印。

1.《中国民族简史》基本结构

《中国民族简史》是一部结构紧密的民族史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大量吸收了当时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成果。全书分为九个专题。作者在第一部分讨论和提出问题,对当时社会流行的大汉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态度给以严厉批判。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只承认汉族是民族,视其他民族为汉族的宗族或宗支的理论,他着重指出:“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民族,他们的起源、历史过程以及现状怎样,法西斯大汉族主义者是完全无知的。他们敢于那样大胆的武断,不仅在企图避免国内民族问题的正确解决,且正是臭名万代的希特勒、荒木贞夫的民族优越论的翻版。”^[11]他明确指出对国内各民族的无知和只承认汉族是民族与马列主义民族问题的基本精神及孙中山民族主义基本精神不相容,对和平民主建设亦有害。《中国民族简史》书写的基本态度符合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精神,有利于和平民主建设事业。在关于中国民族起源问题上,作者追求“解脱神学和假科学的羁绊,揭露法西斯主义者的大汉族主义阴谋,科学的解答这个

问题,以推进并达成国内民族问题的合理解决”,他认为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12]

在《中国民族简史》的第二部分,作者追述了中国民族构成的人种起源,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他借助考古等资料,回应了中国民族种族来源的一些错误观念,在分析过程中,充分估计到问题的复杂性,利用了各种不同资料相互印证并判断和分析。历经数千年的变迁,一个特定区域的居民人口结构及其种群来源并非是显而易见并可随意定义,就当时作者所掌握的资料而言,充分说明中国民族的种族来源显然有很多且很大的困难,通过分析作者表明中国民族的种族来源是多元的,这一基本判断更符合历史实际,“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各民族都不断杂入世界其他民族血液,世界其他民族也不断吸去中国民族的血液;中国各民族相互间的血统混合与同化,更有着一个长期的立体交流的过程……”,^[13]成为对中国各民族历史关系图景的重要描述。

在另外五个专题中,吕振羽先生对当时20多个族体进行分析,主要有: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缠回族、哈萨克族、札萨克族、布鲁特族、唐古特族、罗罗族、苗族、黎族、土番、鄂伦春、达呼尔、呼尔克·黑斤奇勒等。相关分析涉及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现状,涉及民族群体的体质、面貌、分布地区、生存环境、语言、风俗、宗教、文字、居住、婚姻、服饰形态等,重点考察了各族体的生产力状况、社会经济结构、阶级关系演进的历史等。这一部分的基本结构按着汉、满、蒙、回、藏顺序排列前五章,后几章的内容则基本上按着西北的新疆、青海,以及西南、东南和东北各族的顺序叙述。

在最后一部分对中国民族历史研究给出简短的结论。作者指出:“中国各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有着人种血统的相互融合与渗透;作为人种血统来看,民族的界限基本上确已不存在。但是,谁若想从人种血统上去理解中国各民族,那便是违反事实的妄想……”。并进一步指出:

“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人种血统和文化的交流,不只表现为汉族文化影响了他族,汉族同化了他族的大量人口;也表现为汉族不断接受他族文化影响,不少汉族人口被同化。”^[14]他将不同时代族体之间关系的交互影响和演进分成三种情况:

第一,前国家时代,“在彼此都没进到国家时代的部落间,为争夺适合生存的自然条件,引起原始战斗。”结果便是联盟各部落间的同化,“不是战败者被迫退出其原住地区(如‘成汤革命’以前的夏族),便是参加战胜者的部落联盟(如苗族与夏族)”,联盟部落间为着自卫而自愿联合发生同化,“在这种情况下同化,并没有侵略和被侵略,压迫和被压迫的内容,是完全合理的。”^[15]实际上,战败者融入胜利者中的同化在这一过程中同时发生着,历史状况如此,很难简单以合理与否判断。

第二,进入国家时代的族体与未进入国家时代族体之间的斗争。其中包括了进入国家时代的族体保卫民族生存的自然条件,反对未进入国家时代族体的原始掠夺、未进入国家时代的族体争取较优良的生存条件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汉族在生产、人口、文化以至政治、军事的总和力量,常大于其对方,加之这种力量又常能贯串着汉族人民的斗争,发挥作用。因此,与汉族斗争的各落后民族,结果,每每被汉族同化,或在文化上模仿汉族;但他们也每每把汉人同化和在文化上影响汉族。”^[16]

第三,阶级社会时代的民族间的斗争。阶级社会时代的民族间的斗争,实际上即指大一统王朝国家发展时期族体之间的关系,这里作者将王朝时代不同族体政权间的斗争视为统治阶级侵略战争,将回纥、辽、金、元、清视为“奴隶贵族之侵略汉族”;将牛皋等汉族农民的抗金,顾炎武、王船山、吕留良与“下流社会”结合的反满,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余部抗清等视为人民对民族生存权利的保卫;唐朝地主与“吐蕃”奴隶争夺三镇十姓和吐谷浑的宗主权则属于“彼此基于统

治阶级的利益而争夺原始殖民地”。同时指出历史上在不同民族间的斗争中,不断有周边族体成员部分或全部“同化”于汉族,也有汉族“同化”于周边族体情况发生。但是,鸦片战争之后,族际关系最重要的变化是,帝国主义各国的人民很少有“华化”的情况,华人被同化并成为“洋奴”的却很多。作者认为人民革命斗争才是保存中国各民族的基本力量。^[17]

2.《中国民族简史》写作的基本立场

在阅读《中国民族简史》过程中,读者会清晰地体会到作者的写作目的和鲜明的立场以及所怀有的革命理想。《中国民族简史》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为原则,对大汉族主义予以了坚决的批判,对几个少数民族群体历史、现状及前途命运给予多方面的探讨。作者在著作中的最基本的立场包括:

第一,坚定地揭露和批判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在中国民族问题上的错误理论和认知。

自辛亥革命以后直至20世纪40年代,汉族中心主义、大汉族主义思想在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中占据主要领地,变态的大民族优越感也流行。孙中山在改造的国民党纲领中虽然提出“扶持国内弱小民族”的思想,但是,以民族同化为条件。在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面前,国民党不仅不敢于面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民族问题和民族运动,无视各民族意识的转型成长与提升,还于1943年“发明”满、蒙、回、藏、苗的“宗支”和“宗族”论,称“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这多数的宗族,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18]执政的国民党试图借助血统论、文明论,在重新解释中华民族的形成史中为民族压迫和不平等张目。因此,作者尖锐地指出他们这样做,“不仅在企图避免国内民族问题的正确解决”,且是所谓民族优越论的翻版。不仅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民族问题的科学,与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基本精神不相容,对今后全国和平民主事业亦是有害的。^[19]

第二,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开拓中国

民族史研究新方向。

王朝国家时代,有关“五方之民”的历史记载十分丰富,在正史、野史等历史文献有相当多的信息。随着辛亥革命的发生,革命派开辟全新的民族史书写,种族优越论、血统论、汉民族中心论等均成为在革命话语氛围中民族史书写中的流行思想意识。王朝时代“五方之民”之裔间的复杂历史关系是现代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建构中的重要问题,也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自民初至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的民族理论的应用,对民族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吕振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上解释一些问题,并探索各民族的历史前途,尽管他在具体的史实方面有不少误解,但从书的总体上看,代表一个新的研究方向。”^[20]在《中国民族简史》中他将中国人的种族来源丰富性呈现出来,指出蒙古人种、马来人种等是中国人种的来源,否定了中国民族起源地葱岭说。^[21]

3. 句式选择与革命激情的表达

1939年,毛泽东曾在给何干之的信中称道:“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22]这里毛泽东所考虑的主要是民族史研究如何为抗日战争服务的问题,在这里,“民族”显然不是仅指汉族,而是指包括各民族的中华民族。事实上,自辛亥革命以后,民族史的研究很多成果都在为“革命”服务,吕振羽先生开宗明义,明确他所进行的民族史研究是在为和平民主建国事业服务。可以说“革命”话语深刻地影响了民族史研究的目的和视角,至于句式和叙述方面则直接地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激情。

如作者将所有王朝政权之间因权力争夺而发生的战争均纳入侵略和反侵略结构观察,在分析具体民族起源发展历史进程时认为,均曾发生

过侵略与被侵略的过程,汉族侵略周边民族,满、蒙、藏对汉地的侵略等等。

每个民族内部的政治权力斗争,也被纳入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析结构,比如,在分析满族历史中称“努尔哈赤出身建州的革新家族。其祖父日娄,父塔克失曾为反动派尼堪外兰所杀害……”,“‘旗’在最初,原是氏族组织的形式,到努尔哈赤革命前夜,成为带有原始性的斗争组织……”。^[23]对于蒙古社会则称“当蒙古社会正面临到变革时代,又产生铁木真来领导这个革命。铁木真是当时一位具有优越军事才能的革命领袖。”“蒙族内部,还有札木合与王罕为首的保守派,反对革命。铁木真为首的革命派和反革命派的斗争,经过一二零一——六的六年过程,革命派次第把哈塔斤十一部反对派镇服,统一了赞助札木合……”,称铁木真打败了札木合、王罕后“蒙族的革命建国大业,便基本上完成了”,“给参加革命成了功臣的氏族奴隶以某种特权”。^[24]论及藏族社会则称“在噶木布革命以后是奴主文化;宗喀巴‘宗教革命’以后,是封建文化,主要表现为喇嘛文化——哲学的领域,完全为喇嘛教的神学思想所支配,文艺也是寺院文艺占支配地位”^[25]等等。

从句式的选择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我们看到作者直接受到当时革命话语的影响,在分析和认识历史问题时也带有显著的时代政治特色和突显的革命激情,比如将齐桓公和管仲维护政权的活动视为“民族自卫事业”。^[26]实际上,高涨的革命激情和简化的句式可能忽视了某些问题的复杂性,但是,推动了当时中华民族在主权现代国家建构道路上力量的凝聚。

4. 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应用

在《中国民族简史》的写作中,吕振羽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应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理论,分析中国各个民族社会或民族之间的关系。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概念和视角。马克思曾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之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并指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并非历史的最后产物和历史的极限。^[27]吕振羽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将各民族的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联系起来。比如，在分析汉族的发展和民族的斗争时，作者指出秦皇、汉武是“基于大商人地主开发商路的要求，使中国疆土得到空前扩大”，^[28]及历史上中原王朝开疆拓土的阶级利益的动因，“从唐朝到‘鸦片战争’千余年间，汉族曾几度被他族侵入，遭受他族统治，但汉族地主阶级的封建帝国，也有几度扩大对外侵略，统治其他民族”。^[29]在分析非中原人所建立的政权与中原人所建立的政权之间的历史关系时，也正确指出了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竞争过程影响周边不同群体关系，如指出“在三国魏晋期间，由于汉族统治阶级相互间争权夺利的内讧，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穷困与不安，加之地主阶级对他们奴隶式的榨取，他们便从这个缺口上相继突起。但最初，他们曾参加了中国的农民暴动，一同去反对地主阶级，后来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暴动严酷的摧残，并招募他们来镇压农民，他们便利用地主阶级给予的器械、资财，渐次独树一帜……”，从而演成“五胡十六国”。^[30]

对于中原人口分布区域的不断扩大这一历史现象，吕振羽先生除从统治阶级扩大疆土这一视角分析，还从农民的土地饥荒来解释，“在数千年过程中，每经过一次农民战争，或民族反侵略战争，在农民要求土地的基础上，汉族人口便有一次大移动——在土地饥荒的经常情况下，也不

断有人口的移动，移动的方向，主要是南面和北面。”^[31]因此，认为“汉族在数千年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掌握统治权的大地主大商人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贯地对内残酷压迫，对外卖国、投降、妥协，招来多次的异族侵略和统治，同时他们从狭隘的阶级利益出发，也多次去侵略他族，对国内其他姊妹民族，实行大汉族主义的压迫。一方面，由于汉族人民一贯地对侵略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艰苦斗争，对民族和阶级压迫者举行了无数次暴动和革命，不仅保存了自己的民族，而且壮大了自己的民族”。^[32]再如，通过阶级分析，指出藏族社会的政治特性是喇嘛握有“无上”的支配权力，教权贵族及其支配下的俗权，又都存在着严格的等级身份制。^[33]

第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分析各民族社会状况。

马克思通过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第一次对人类社会的几种主要的“所有制形式”的性质及其依次更替发展的基本过程做了系统的阐述，将前资本主义三种主要的所有制形式分为：“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34]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作者将抗战胜利后汉族地区的社会形态分为两种：一种为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初期的形态，这一形态表现出“封建的生产方法已逐渐被消灭，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已渐次获得支配地位”；另一种为国民党统治区的形态，这里“还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支配下的封建生产方法占优势，各个省区的经济分散性与独立性，也没有完全消灭，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则是依附外资，主要是美资的，买办性不只浓厚，且步步在加重”，“实质上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而且有步步走向殖民地化的危机”。^[35]作者尖锐地指出：“汉族还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独立民族，还表现为两种社会形态。”那就是“只有一小半的减弱或消灭封建剥削，完全没有外力的支配，

建立起自主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在大半的领土上,还是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专制独裁统治,并且完全受着美国帝国主义的支配。”^[36]对其他民族的阶级状况,在掌握一定资料的情况下也进行了社会形态的简要分析。

第三,依据中国民族构成历史的实际,吕振羽先生运用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分析汉、满、蒙、回、藏、苗等民族群体。

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早在1929年就为中国学者所运用,当时译称“民族是历史所形成的‘常住的人类共同体’,而且是由于有‘共通的语言’、‘共通的居住地’、‘共通的经济生活’,以及於共通文化中所发现的共通的‘心理的能力’而结合的人类共同体”。^[37]1936年这一概念又被描述为“民族是历史上有共同的语言、领土、经济联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基础上而是有同一心理的人们所形成的固定性的集团”。认为缺少上述的一个条件便不成为一个民族。^[38]到1948年,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对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中国民族问题已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从吕振羽对回族和东北各民族的论述来看,他已将构成“民族”的要件与不同民族构成的历史实际结合起来,而不是坚持任何一个条件都不可缺少的民族要件构成原则,面对中国社会实际灵活运用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

在分析汉族中,作者指出:“汉族在很早的过去,就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字和通用的‘官话’。(1)现在的文字,不是大众化的文字,还须加以改造;(2)还有一些地方的独特意义的文字……语言方面,在通用的‘官话’以外,有着多种多样的不统一的地方话,所谓‘十里不同音’,特别是所谓的‘广话’、‘福话’、‘客话’,几使外省人很不易通解。使全国性的、地方性的、阶级性的现有语言文字的完全统一,还须经历一个革命的过程,并且不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以外去完成。”“汉族在文化心理状态方面,是有着共同特征的。其中如支配封建时代的儒家哲学、伦理观念、宗教信仰(佛、道、巫)、文学艺术的作风气派

等等,虽有不少积极的因素,在今后民族精神生活内容中,仍将被吸收遗留下去;但从其主要构成说,一面有着适应于各阶级的质的差异,一面又有在扬弃中的封建性的东西。”^[39]

面对人们是否还将满族作为一个民族看待的社会质疑,作者根据满族的实际情况,通过语言文字、社会生活分析指出,满族“虽在语言文字、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已不易与汉人区别开,但在其内部还保留一种民族情感的联系”。他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所宣称的满族也是“炎黄子孙”,是汉族的“宗支”和满族已完全不存在的说法。^[40]民国时期,回族的民族身份也受社会上一些人的质疑,他参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从居住地、语言文字、文化心理状态、经济生活几个方面分析回族的构成,称“作为现代民族所具备的诸特征来看,回族,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已渐次在消失,或还没有完全形成。她确实还不是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却是中国境内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41]

由于当时各种资料信息的缺乏,使得吕先生对一些民族群体的分析或介绍还比较粗糙,甚至有些错误,有时同一民族的不同部分被当作另一个单独的民族单位被提及。比如,1948年,中国的蒙古族主要分布于内蒙古、黑龙江、青海、新疆等处,当时蒙古民族问题在中国显著的表现内蒙古历史道路选择问题。吕先生使用“内蒙古族”和“内蒙民族”指称内蒙古的蒙古社会,透过当时内蒙古的蒙古族居住区域、生产力状况、“各阶级阶层”间显著差异的人民生活、语言文字状况、共同的“民族感情和对其民族历史的回忆”等,分析指出“内蒙还是中国境内一个较落后的少数民族,离现代化的程度还有相当距离,还须经历一个艰苦斗争的过程”。^[42]同时,却将分布于东北省和西北的蒙古部落,如巴尔虎、布里雅特等视为单一的民族单元。

可以说,吕振羽先生在《中国民族简史》里使用的“民族”定义并非严格意义上遵循斯大林所提出的国家民族的定义,而是依照中国各民族

群体长期交往、互动的状况,以及当时民族人口的分布,在参照斯大林民族定义基础上定义构成中国的各个民族群体。

5. 科学理性与现实观照

《中国民族简史》的写作虽然选择了新视角来观察和研究中国各民族社会,并受到“革命”话语的深刻影响,但是仍然保持了应有的科学理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使吕振羽先生在民族史书写中的逻辑思维特征和认知模式更具科学性,正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着作者围绕中国民族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来分析中国各民族状况,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民族平等原则,解读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并且十分注重信息来源的多元性和丰富性等,文献资料、访谈资料与调查等多种信息来源,强化了其研究成果的客观性。更为重要的是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科学分析所得资料,涉及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苗以及维吾尔、哈萨克等数十个民族社会,对各民族社会的生产力状况、社会经济形态与阶级关系演进等历史发展进行分析与阐释。比如,作者利用考古资料、文献记载、民俗资料等,分析汉族的起源,指出汉族源于商、夏两大骨干的相融,“华族”本身的构成成分并不是“本支百世”的“文王子孙”。对于汉族的历史追述不仅仅限于族源的寻找,事实上是更多的内容属于汉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的范畴,在分析中,使用了侵略与反侵略、革命与反革命、压迫与剥削的理论分析框架,汉族被描述为一个“有固定的领土”但被日本帝国主义分割成两种形态、有“半殖民地半封建,封建的生产方法占着支配地位”的经济生活、有“很早的过去,就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字和通用的‘官话’”、“在文化心理状态方面,是有着共同的特征的”还没有完全现代化的民族。^[43]在研究一些民族的具体问题时如遇信息不足,除提出自己的推断,还会特别说明存疑,以待未来深入的研究。比如,论及维吾尔族时,提出“是今日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又是新疆境内第一个人口较多的民族”,“从中

国文献的记载看,‘缠’族早已进到贫富分化的阶级社会时代。现在其社会内部的矛盾,已颇形剧烈。发生于‘汉回’的伊斯兰教派斗争,常常伸展到‘缠’族,这种教派斗争,每每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但‘缠’族今天的社会性质,我手边没有资料来说明。”^[44]

科学理性从来服务于现实社会,与中国传统的历史著述不同,吕先生关注点在于大众或被压迫阶级的利益,为此,他高度关注蒙、回、藏等民族的现状和出路,并辟专节加以讨论。他指出摆在内蒙民族面前的有几条道路。一条是依靠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一条是立即“独立”的道路,另一条就是“内蒙古自治运动委员会”所领导的发展道路,民族平等地位的获得、民族内部人民平等权利的确立、土地和牧业问题的解决、人民生活的改善与提高、民族特性的保持都需要“从人民大众,从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创造民族的新文化,把人民从迷信愚暗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至于内蒙和外蒙民族家庭的问题,将来如何处理,是要从将来革命形势发展和蒙族自身的情况如何来决定的。”^[45]

对于回族的现代化,他根据解放区回族社会地位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民族家庭的生活,他们是感受适意和满足的。这一局部的范例,无疑地表现了解决回族问题的一个方针。”^[46]“回族解放的一个最基本问题,在于达成经济的现代化。这首先而又最基本的,需要把回族人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和牲畜关系中解放出来。”“其次,回族人民需要从封建隶属性的关系下解放出来,获得人格上和政治上的自由,组织一个回民自己的或代表回民的民主政权——新民主主义政权。”“回族解放问题不能离开全国问题单独获得解决。”“支配回族的保守和反动势力,不论在其内部或来自外部,都是比较强大的,有组织的。”^[47]

在革命语境下的民族史写作过程中,吕先生不仅充分表达了革命激情,也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理性,并注意遵循民族平等原则,

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中心主义的表述,并对大民族中心主义和大汉族主义思想给予了全面反击,指出中国民族问题解决的必要条件,那就是“全国性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是首先必要的,各民族人民都应为此政权的实现而斗争”。^[48]从理论上进一步指出建构各民族平等和现代化中国的一种可能性,即“在完成共同斗争任务的基础上,各落后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以至军事各方面,都可以获得先进民族的帮助,采取适当步骤,使落后赶上先进,加速完成现代化过程,各民族相互间的问题——如居住地区的调整问题等,也可以在新民主主义民族兄弟家庭中,获得合理的解决;同时,也可以自由分立或联合”。^[49]

三、《中国民族简史》提到的族称简析

《中国民族简史》重点研究了汉、满、蒙、回、藏、苗等族体,并在资料信息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对所述及群体的起源、体质、面貌、分布地区、生存环境、语言、风俗、宗教、生产技术、阶级关系、文字、婚姻形态、政权、战争等进行描述和分析。70年已经过去,由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的局限,特别是资料信息方面的限制,以及处于新的学术规范构建之初的特征,吕先生所提及的一些族体已不为人们所知并存在不同争议,主要有以下几个族体:

关于汉族的族称。汉族作为一个具有与近代国家建设的政治意涵相关的族称,显然是近代王朝中国国家转型的产物,在国家政治动荡和战争条件下以及当时的政治理念环境下,作者虽然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说明汉族是以华族或华夏族为核心融入其他民族的起源和初步发展进程,但还尚未辨析从“汉人”至“汉民族”变迁中的时代转换和动力何在。吕先生称“汉族是全世界第一个大民族……”,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作汉族,这一结论显然受到清末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革命派将王朝中国汉人“民族”化结果的影响,将汉族之称溯及汉朝。其实,王朝

历史族别化写作本身就是王朝政治结构转型的后果,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大背景下,渊源复杂、人口众多的“民人”“汉人”在民族国家理论支撑下,在推翻封建王朝政治力量的推动下,才逐步向汉民族转化。

吕先生追溯回族的起源时,指出了伊斯兰教在回族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回族在元朝以前的历史时代,一面有革命和反侵略的光荣斗争传统;另一方面,由于不断受到隋、唐、辽、金等朝代统治者的侵略、支配和分割,民族发展的历史又受到歪曲——特别表现为其各部分间历史发展程度的不平衡……”。^[50]可见,作者并未对回族形成的动态过程予以充分考虑,似乎回族一开始就是由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族体发展而来,但是受到王朝中国社会的侵略、支配和分割才变为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从后人的研究成果来看,“在回回民族形成时,既不存在共同的地域(当然有相对性的集中居住),也不存在共同的经济利益。”^[51]虽然回族的起源直到今日亦未有精确定论,仍然不断有新说提出,形成时间则有元代说、明代说及16世纪中叶说。^[52]无论如何,当代中国的回族群体形成过程中包含的其他民族成分很复杂,其先民最早可追溯至唐朝时来自阿拉伯、波斯的蕃客或蕃商,这些穆斯林“主要集中在都城长安及沿海广州、泉州、扬州及海南岛一带,人口逐渐繁衍,到唐末时估计不会少于三五十万”。^[53]历经宋元两朝,元代以来回族先民广泛参与王朝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至明代时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已基本完成,昔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西域人或被迫东迁的回回人,也已不仅仅是归附了伊斯兰教的各族人口,由于伊斯兰教的聚合作用,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包含昔日阿拉伯人、波斯人、蒙古人和汉人等群体,在汉文化和伊斯兰教汉化过程中形成一个新型的民族共同体。^[54]正如吕先生指出,在回族的形成中伊斯兰教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吕先生著作中使用了“缠回”一词指称当代中国的维吾尔族。1935年,新疆省政府布告已

正式使用维吾尔族族称。从作者所论来看,主要还是限于资料信息的不足,因而才使用了社会上广为流传和习以为常的族称。在对新疆境内各族的描述中,还提到布鲁特族,即今新疆境内的柯尔克孜族(布鲁特出自当时准噶尔语音译,意为“高山居民”“高原人”)。《清史稿》(卷529)称:“布鲁特分东、西二部。东布鲁特在伊犁西南一千四百里,天山特穆尔图淖尔(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之伊塞克湖)左右……其部有五,每部各一鄂拓克(蒙古语音译,社会组织单位,范围大小相当于千户,由地域接近又有近亲关系的亲族集团组成)。……西布鲁特与东布鲁特相接,在回疆喀什噶尔城西北三百里。西接布哈尔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之布哈拉)。道由鄂什山口逾葱岭至其地……凡十有五部,……衣冠风俗皆同东部。”^[55]由于没有相关的实地调查信息支持,文献资料也有限,因此分析也十分简要。他提到新疆境内人口少于哈萨克族的一个群体,即札萨克族,称这一族体“也还停留在原始公社制阶段”,^[56]由于阅读有限,尚未能找到历史文献验证此札萨克族所指,只知道“札萨克族”应是一个游牧部落,据书中的相关信息推测有可能是指称游牧于阿尔泰区域的蒙古札萨克图汗部。

吕先生也提到唐古特族,称“唐古特族,中国古代文献也称之为羌;元朝称为唐古特;清朝从大满族主义出发,称之为‘番’或‘西番’”,唐古特人分布于:“甘肃循化、庄浪、贵德、洮州,四川杂谷、懋功,西康打箭炉,云南维西、中开^[57]……”。“唐族的起源,多数史家均认其为图伯特族的一个部分,唐族自己也有来自西藏的传说。”^[58]无论是从人口分布,还是从社会特征来说,文中所称之唐古特均指古老氏羌族系族体,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大多识别为藏族。他还提到“有些史家和民俗学者,把么些、怒子、曲子和‘西番’(即唐古特)区别开是不妥当的”。他认为这些群体“基本上仍属同一民族”。^[59]这里所提到的“么些”“怒子”为纳西族、怒族他称,“曲子”为独龙族他称。吕先生认为“现散布于

云南、双江、澜沧、佛海、维西、贡山诸县的所谓罗黑、栗栗、窝尼、阿卡等,也都是属于罗族^[60]的一些部分”。^[61]“罗黑”或“倮黑”“栗栗”为拉祜族、傈僳族他称,“窝尼”“卡多”和“阿卡”是哈尼族的自称,“布都”“布孔”“必约(碧约)”“西摩罗”“糯必”“麻黑”则是哈尼族的他称。

在西南各族中,苗族是一个人口众多且历史悠久的族体,作者认为“苗族,是中国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其中大别有苗、瑶(去掉王旁)、董各部”。^[62]从其具体的描述来看,显然这里所说的“苗族”包括了今天的壮族,还有瑶族。其实,在作者所描述的区域,特别是贵州省的黎平、从江、榕江、天柱、锦屏、三穗、镇远、剑河、玉屏,湖南省的新晃、靖县、通道,广西的三江、龙胜、融水等地还分布着侗族,他们曾经被称为“洞苗”,还可能包括了布依族,因为布依族也曾被称为“布仲苗”。在西南民族群体的讨论中,作者还提到“僂族”,“僂族内包僂子、‘民家’等部”。^[63]实际上,僂子、百子、白尼、白伙都是今天白族的自称,其文中提到的“蒲蛮”是布朗族的他称。后文又写到的掸族,则是傣族的他称,“摆夷”“水摆夷”也都是傣族的他称。“在云南境内还有其他许多少数民族,如所谓‘蒙克穆语系’的瓦崩,内包瓦、拉、崩龙等部;‘藏缅语系’的卡箐或箐跑;缅甸族的术子、阿昌、马鲁、喇僊、阿系;此外还有安南族以及沙人、吕人等等”。^[64]这里所说的“蒙克穆语系”应是指“孟高棉语族”,而“瓦崩”就是瓦、崩龙的简称,“崩龙”为今德昂族的自称,而“瓦”则是今瓦族的自称,“拉”很可能是瓦族的他称,“瓦、拉、崩龙等部”实际上指今瓦、德昂、布朗族。至于“卡箐或箐跑”则应是指今日景颇族,其中包括称为“马鲁”——“自称曰郎。系人及刺奚人称之曰那郎或郎。卡箐人称曰马鲁。”^[65]“喇僊”“阿系”亦皆为景颇族之称。这里所称的沙人、吕人则主要是壮族的一部分。

对东南沿海各族的关注,主要有黎族、“土番”“蛮民”和“畬民”,黎族即今日黎族,“畬民”则指今日畬族,“土番”则指台湾原住民族,“蛮

民”又写为“查民”，主要分布于广东、福建、广西等沿海港湾和内河上，以船为居，罗香林先生称其为古代越族遗裔，因受特殊影响，遂致浮家泛宅，以水为生。^[66]而吕振羽先生则认为“‘蛮民’还是国内一个遭受极度压迫的少数民族。不过只要取消对他们那些不平等的限制，便没有作为一个民族看的独自的问题了。其他的问题，就可以与汉族人民一同去解决”。^[67]

对东北各族的叙述主要有“鄂伦春族”“达呼尔族”“索伦族”“布里雅特族”“陈巴尔虎族”“呼尔克·黑斤奇勒族”6个民族。“鄂伦春族，为通古斯之一支，散布于东兴岭、黑龙江上游的诸溪谷间。”^[68]作者对这一民族的信息看来掌握得较多，因此，对这一群体的生产生活给予了较为详细的叙述。“达呼尔”是达斡尔族自称，汉文志书中又写为“打虎儿”“达瑚里”“打虎力”“达呼里”“达古尔”“达乌里”“达乌尔”等不同音译，其族源正如作者指出的一曰与蒙古同，或曰为契丹后裔，尚未有明确答案，但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相当多的达斡尔族知识分子曾认同自己为“达斡尔蒙古”。文中所提“库尔喀”“虎尔哈”“胡尔哈”实则均为东海女真著名部族“库尔喀”的不同译名。“索伦”清初曾为今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各族部名统称，康熙22年以后才成为指称鄂温克部的称谓，^[69]实系构成今日鄂温克族的一部分。“布里雅特族”“陈巴尔虎族”则并非一单独的民族单元，而是构成蒙古族两个部落名称。“呼尔克·黑斤奇勒族，为通古斯之一支，又被呼为所谓‘鱼皮达子’”。^[70]“呼尔克·黑斤奇勒族”指称今日赫哲族，其中“呼尔克”大约为“呼尔哈”“虎尔哈”之称，但非族名，而是女真部名，赫哲人曾从属此部；“黑斤”汉语对赫哲之称，还写成“黑津”“黑哲”“赫斤”“赫金”等，赫哲语为“下游”“东方”之义；“奇勒”应是赫哲语“奇楞”的另一写法，“奇楞”指赫哲族中早年从黑龙江上游乘木筏至勤得利以上地区散居下来一部分，下游的人们称这部分为“奇楞斯勒”，其后凡移居此地的赫哲人便不加分辨地

都被称为“奇楞”，^[71]所以“呼尔克·黑斤奇勒族”实际上就是三个名词的叠加，“黑斤”“奇勒”均指赫哲族。

吕先生还写到：“中国境内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如西藏境内的东女族（《新唐书·东女传》说：‘亦曰苏伐刺拏’）、唵哒族，因手边没有现实的可靠资料，暂不作何叙述；也可能还有不少我不知道的少数民族。这只好待之将来的实地调查研究与集体的努力。”^[72]东女族，在《隋书》卷67列传32、《旧唐书》卷209列传147和《新唐书》卷237列传146上均有记载，《旧唐书》称其为“羌别种”，这是一个社会结构较中原社会特殊的群体，主要是“以女为君”，但是，从所记之相关信息来看，这是一个兼营牧业和农业的社会，他们所居“地寒宜麦，畜羊马，出黄金”。并曾有一部分人口内附但仍与吐蕃有重要的联系，“东女族”显然应为古代氐羌系的部落之称。“唵哒族”则不知确指，有可能和东女族一样是在对历史资料分析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度之可能为“嚧哒”的另一写法，“嚧哒”的活动记载则见于《魏书》《梁书》《隋书》和《唐书》，《魏书》称：“嚧哒国，大月氏之种类也，亦曰高车之别种，其原出于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阗之西，都马许水南二百余里，去长安一万一百里。”这同样是一个游牧社会，“无城邑，依随水草，以氈为屋，夏迁凉土，冬逐暖处。”^[73]为中亚部族，其族属有多种说法，如高车、月氏、车师、康居、柔然、蒙古、突厥、伊朗、悦般、鲜卑等等，五世纪时其国势强盛，后为突厥所破，部落分散。^[74]

总之，《中国民族简史》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中国各民族历史进行了尽可能广泛的叙述，历史学家蔡美彪先生曾指出“本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进行综合考察的最早著作”。“吕老1948年在哈尔滨编著本书时，不仅不能像50年代以后那样可以获得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而且在利用旧有资料和前人成果方面，也不能不面临很多困难。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见的。”^[75]白寿彝先

生也曾指出：“吕振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上解释一些问题，并探索各民族的历史前途，尽管他在具体的史实方面有不少误解，但从书的总体上看，代表一个新的研究方向。”^[76]自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问世至今已过了70多个春秋，7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还处在国家政治转型的关键阶段，道路之争导致战争是解决政治问题的主要手段，在这样的条件下展开少数民族社会的研究当然十分困难，资料少之又少，又不可能开始大规模调查，在如此困难的环境条件下撰成《中国民族简史》实属不易。70多年后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社会民族关系也发生历史巨变。当代人回溯70多年前中国民族史研究无疑有很多优势，特别是在资料的获得、已有成果的参照、观点表达以及多角度视阈的获得等等，同时，当代人也不得不慨叹，在70多年前的民族史书写中将革命激情与科学理性把握到恰到好处亦十分困难。中国民族史研究不仅有诸多关于起源的未解难题，甚至近代以来各民族发展演变进程的研究也还缺少应有的深度，有待后来者不断的努力。

注释：

- [1] 钟玉恒：《吕振羽的〈吕氏留念亭碑序〉》，《湘潮》1985年第5期。
- [2] 刘茂林、叶桂生：《吕振羽评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页。
- [3][4][6][10] 朱政惠：《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4、4-7、4-7、17-19、166页。
- [5] 戴开柱：《吕振羽早期思想与实践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页。
- [7] 以光华书店1948年9月出版的《中国民族简史》为样本分析。
- [8] 戴开柱：《论抗战初期吕振羽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及其历史地位》，《史学集刊》1996年第1期。
- [9] [11][12][13][14][15][16][17][19][23][24][25][26][28][29][30][31][32][33][35][36][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6][58][59][61][62][63][64][67][68][70][72] 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光华书店，1948年，第1、2、3、11、161-162、163、163、164、2、48、50、64、65、66、113、16、17、20、17、27、34、112、36、36、37-38、58-59、102、75-78、38、116、81、103、104、168、169、93、

118、121、123、124、131、140、144、150、151、159、159页。

- [18]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中正书店，1946年，第2页。
- [20]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0页。
- [21]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北平文化学社，1928年，第1页。
- [22]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20页。
-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7页。
- [34]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马克思恩格斯卷》（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11-112页。
- [37] 郭真：《现代民族问题》，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29年，第7页。
- [38] 焦敏之：《民族问题大纲》，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年，第7页。
- [51] 张声作主编：《宗教与民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0页。
- [52] 王钟翰：《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36页。
- [53] 邱树森：《贺兰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28页。
- [54] 参见《回族简史》编写组：《回族简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21页。
- [55] 潘志平：《浩罕国与西域政治》，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3页。
- [57] 应是“中甸”，见李绍明、童恩正：《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报告之二·雅砻江上游考察报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印，1985年，第66页。
- [60] 罗罗族历史上指今天的彝族。
- [65] [英] 台维斯：《云南各夷族及其语言研究》，张君劭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年，第73页。
- [66] 罗香林：《僮民源流考》，载广西民族研究所资料组编：《少数民族史论文集》（3），1964年，第141页。
- [69] 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4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1521页。
- [71] 《赫哲族简史》编写组：《赫哲族简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7-9页。
- [73] 《魏书》列传90，西域。
- [74] 石云涛：《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29-33页。
- [75] 蔡美彪：《重读〈中国民族简史〉》，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2页。
- [76] 白寿彝：《民族史工作的历史传统》，《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

〔责任编辑：刘姝媛〕